

- [23] Stalin, J. V. "Marxism and the National Question,"
<http://www.marxists.org/reference/archive/stalin/works/1913/03a.htm#s1> (accessed November 11, 2014).
- [24] OMB, "Directive No.15 Race and Ethnic Standards for Federal Statistics and Administrative Reporting," May 12, 1977
<http://wonder.cdc.gov/wonder/help/populations/bridged-race/directive15.html> (accessed November 25, 2014).
- [25] Nobles, Melissa. *Shades of Citizenship: Race and the Census in Modern Politic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 [26] 人口调查登记表填写说明[J]. 陕西政报, 1953(5).
- [27] 黄光学. 民族识别和更改民族成份工作已基本完成——国家民委副主任黄光学答本刊记者问[J]. 中国民族, 1987(2).
- [28] 丹珠昂奔. 沿着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前进——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学习体会[N]. 中国民族报, 2014-11-15.
- [29] OMB, "Standards for the Classification of Federal Data on Race and Ethnicity," August 28, 1995
http://www.whitehouse.gov/omb/fedreg_race-ethnicity (accessed November 25, 2014).

【论 文】

港澳学生的国家认同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暨南大学的问卷调查¹

梁茂春

内容提要: 根据对暨南大学 4053 个样本的问卷数据分析, 我们发现相对于港澳本地居民, 在中国大陆高校就读的港澳学生对中国人身份的认同度更高, 但却比中国内地学生的明显较低; 不仅如此, 他们对港澳回归中国的拥护程度、维护中国领土主权的意识以及对中国社会政治制度等方面的评价均显著低于内地学生; 在港澳学生中, 港澳本地出生者比非港澳出生者的中国国民认同感也明显较低。港澳学生对中国人身份的认同度、对港澳回归中国的情感反应与他们同中国内地学生、居民之间的跨群际交往机会和交往的亲密度并不存在相关关系, 却与他们的政治态度密切相关。

关键词: 国民认同、领土主权意识、群际交往

数十年来全球各地族群民族主义运动的风起云涌、此起彼伏, 使学术界对少数群体(族群)国家认同或国民认同(national identity)²的研究日益升温。那些具有独特文化特性、群体认同或享有高度自治权利的少数群体如加拿大魁北克的法语群体、南联盟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人、中东

¹ 本研究获得暨南大学统战部的经费资助。在此特别感谢马戎老师及各位同门在研讨会期间对本项研究提供的意见和建议, 文责自负。感谢暨南大学历史系的刘友连、周正庆老师和国际关系学院的陈文老师以及我在暨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众多同事(限于篇幅, 在此不一一具名)为问卷调查所提供的各种帮助, 感谢我的两位 2011 级硕士研究生张祥云、隋国利同学帮助我发放和回收了大部分问卷、并录入了全部问卷数据。

² national identity 在学术界有多种译法: 民族认同、国族认同、国民认同等等。为了与已经开展大量港澳居民国民认同研究的港澳地区学术界的中文语境相适应, 本文统一采用“国民认同”一词。

一些国家的库尔德人等尤其倍受关注。中国港澳地区的居民虽然不像上述这些少数群体那样在种族、宗教和语言等方面与中国大陆的多数群体存在巨大的差异,但长期的殖民统治历史塑造的“非国家化”的地域性认同、“一国两制”的背景下他们与中国大陆居民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方面所享有的权利迥然不同以及与中国大陆依然存在地理、社会上的显著隔离……这种种因素,使他们成为中国的一个非常特殊的少数群体。人们不由地产生这样的疑虑:这个群体能否由衷地“回归”中国并与占绝大多数的中国大陆居民同舟共济、积极参与由中国大陆主导的民族国家建设?

一、相关研究

事实上,近年来的相关调查数据一定程度上增强了人们的这种疑虑。香港和澳门回归中国前后,境外学者和研究机构对港澳居民国民认同开展了调查研究,其中多数是关于香港人的身份归属、香港人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等方面评价的调查分析。由于十多年来这些调查一直持续开展(Wong, 1996; 王家英等, 1996 & 1997 & 1999 & 2002 & 2004 & 2007; Lau, Siu, 1997; Fung, 2001 & 2004; 萧新煌等, 2008; 郑宏泰等, 2008; 岭南大学公共管治研究部, 2009; 香港大学民意调查中心, 2010; Lau, et al, 2010; Wang, 2012), 因此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关于香港居民国民认同的纵贯数据。值得注意的是,所有的描述性研究得出了一个大致相同的结果:自回归的十多年以来, 尽管期间香港居民的国民认同曾随着 2008 北京奥运会等一些重要国际性事件的影响而波动, 但总体上呈现出“二元认同”逐渐上升、纯粹中国人认同日益下降的趋势。最近的调查研究表明, 自认为属于纯粹的中国人的香港居民未超过三成(Wang, 20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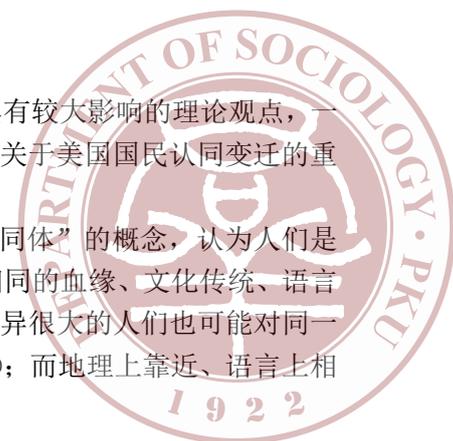
究竟是哪些因素影响了港澳居民对中国国民身份的认同? 有的学者认为, 对人权自由的认知很可能是影响其国民认同的重要因素。越是支持人权自由的受访者, 支持族裔自决的意愿越强烈, 国民认同则越弱(Wong, 1996)。另一些学者在研究中发现, 跨国经验(包括求学、交流活动、经贸合作、观光旅游等)、社会阶层、年龄世代也会影响到对中国国歌、国旗的自豪感等中国国民认同状况(Fung, 2001 & 2004; 马杰伟, 2011)。不过, 探讨影响香港居民国民认同因素的经验研究并不多。绝大多数学者在解释这个问题时, 仍主要从历史的角度出发。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是: 香港居民的国民认同之所以难以迅速地转移为中国大陆主导的“大中国认同”, 是长期的殖民地历史文化遗产、自由民主思想的盛行以及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等多种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Mathews et al. 2008)。

显然, 上述研究有必要进一步拓展。以往的研究较少关注居住在中国内地的港澳居民的国民认同状况, 缺乏对与内地居民交往较多的港澳居民的分析。本文通过对在中国大陆高校就读的港澳学生的问卷调查数据, 试图了解(1)与港澳本地居民相比, 在中国大陆就读的港澳籍大学生是否对中国人身份有更高的认同?(2)具有不同人口学特征(如出生地、普通话的流利程度、与中国内地学生的交往程度等)的港澳籍大学生是否在国民认同上存在显著差异?(3)港澳籍大学生对中国政治环境因素(如中国人权状况、中国共产党执政等)的评价是否与其对中国国民认同存在相关性?

二、理论与假设

关于港澳人的身份认同, 我们需要关注当前两个貌似对立的、具有较大影响的理论观点, 一是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关于国民认同的经典概括, 二是塞缪尔·亨廷顿关于美国国民认同变迁的重要分析。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 1983)提出“想象的共同体”的概念, 认为人们是否认同为一个民族共同体(national community)成员, 与是否共享相同的血缘、文化传统、语言没有必然联系。相距遥远、从未谋面而且血缘、宗教、语言、习俗差异很大的人们也可能对同一个民族(nation)产生强烈认同(如马来西亚的苏门答腊人和安汶人); 而地理上靠近、语言上相



通、宗教信仰相同的马来西亚的马来人和印尼苏门答腊岛东岸的马来人相互间却看作是不同的民族(nation)。因此,共同体成员之间不必需要有基因(血缘)、社会相似性、面对面或亲密的交往才产生共同体认同,关键在于他们之间是否存在“共同体想象”。当然,这种“共同体想象”又主要产生于文字(阅读),即民众受到民间或官方民族主义的有效宣传或动员。

安德森的观点对有关族群认同、族群民族主义(ethnic nationalism)以国民认同(national identity)等研究议题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某些经验研究数据无意中为安德森的观点提供了依据:除了非洲裔美国人之外,尽管欧洲裔美国人与亚裔、拉美裔等族裔之间在种族、文化方面差异较大、族际(群际)交往程度也不尽相同,但他们在国民认同上并不存在显著差异(Huddy, et al, 2007)¹。

近年出版的一部名著《我们是谁?》与安德森的观点不同的是,它十分强调基因(或血统)、种族文化在国民认同中的意义。作者亨廷顿(2005)认为:美国的盎格鲁·萨克森种族人口、新教文化比重正在日益下降,而拉美裔人口、文化比重则在迅速上升,这将不断削弱美国主体族群所构建的美国价值观的影响力,从而有可能最终瓦解盎格鲁血统白人主导的美国国民认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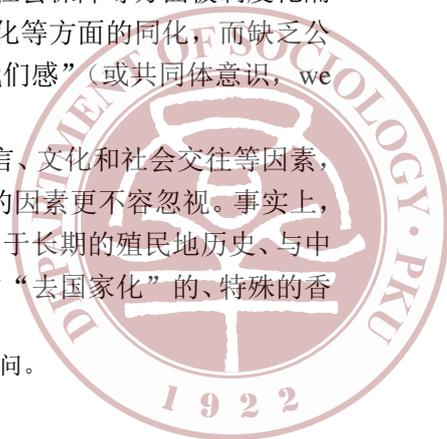
亨廷顿的理由是,拉美裔同化于美国主体族群(盎格鲁血统白人)的程度较低,表现为与主体族群相互隔离、文化差异巨大,例如:不会说英语,普遍使用西班牙语,与白人之间存在显著的居住隔离,从而在美国西南地区形成日益庞大的“西班牙语区”,他们对美国的国民认同很低(他所引用的文献资料表明,只有不到50%的拉美裔认同为美国人),而对其祖国却表现出较强的国民认同,成为分离美国民族共同体的最大力量。

上述两种理论观点的区别是相当明显的,安德森强调“共同体想象”对国民认同的重要性,而亨廷顿则强调同化的意义。前者认为即便两个社会群体被自然地理或社会空间分隔开来,亦即缺乏血缘关系、宗教信仰差异显著、语言迥异甚至生活在不同国度的群体也可能产生所谓的“远距离民族主义”(long distance nationalism),并形成对某一政治共同体(民族国家)的“想象”或认同,人们对民族国家的认同将主要取决于民族主义动员;而后者则认为两个社会群体被自然地理或社会空间分隔开来,则少数族群同化于主体族群的过程就难以完成,从而使少数族群对主体族群所主导的国民认同建构产生负面影响。

上述两种理论观点对本研究的启示是,自港澳回归之后中国大陆主导的国民认同建构似乎一直在有意或无意间沿着两条线索展开:一是中国大陆官方在港澳地区实施的国民教育(有人称之为“洗脑”),此种教育犹如安德森笔下的“官方民族主义”(official nationalism),试图通过国家有计划的国民认同教育以强化人们对国家共同体的认同,例如通过媒体宣传、学校教育等手段,强化港澳居民对中国大陆主导的政治共同体(民族国家)的“集体想象”。这种途径无疑是自上而下的。二是自下而上的途径,这与亨廷顿所谓的“同化”过程相似:随着港澳地区与大陆之间面对面的、广泛的社会交往增多,港澳人的地域性认同逐渐弱化,并自然而然地重新凝聚和巩固“中国人”(或“炎黄子孙”、华夏民族)共同体的认同。本研究不打算探讨官方国民教育的效果,而只是试图探讨:在实施“一国两制”、两地居民在政治权利、社会保障等方面被制度化隔离的大背景下,港澳与大陆居民的“有限同化”(只有社会交往、文化等方面的同化,而缺乏公民权利方面的同化)能否使港澳居民形成与中国大陆居民之间的“我们感”(或共同体意识, we feeling),并增强对中国人身份的认同?

影响“我们感”这种国家命运共同体的我群意识的因素不仅有语言、文化和社会交往等因素,也有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利平等共享的状况,对港澳居民而言,历史的因素更不容忽视。事实上,一些学者将回归十数年之后香港居民的国民认同依然较低的事实归因于长期的殖民地历史、与中国大陆的地理社会隔离所导致的国民认同“迷失”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去国家化”的、特殊的香

¹ 不过这些研究的调查样本量都比较少,仅300个样本,是否具有代表性仍存疑问。



港地域认同。换言之，百年殖民地历史使香港人出现了国民认同上的“结构性失忆”（Gulliver, 1955），即逐渐淡忘或失去作为“中国人”的集体记忆，同时却受殖民制度的“非民族主义化”、“非政治化”和非现代公民教育（Tse, 2004a;2004b）的影响而强化了香港本土认同。

目前，港澳地区正处于国民认同重构进程的初始阶段，我们确实不应期望港澳居民迅速产生与中国大陆居民那样强烈的国民认同。但是，我们的猜想是：随着港澳与内地之间互动的增多和了解加深，也许可以促使港澳居民逐渐产生与中国大陆居民的同一体归属感，从而增强对中国的国民认同。以研究的便利性而言，大陆高校的港澳学生群体就是一个不可多得的“试验品”，他们深入内地，接受大陆的教育，与大陆居民一起学习和生活。这种共同生活经验及其“文化亲近性”（cultural nepotism）将有助于强化华人族群或中国公民之间的凝聚，重塑港澳人作为“中国人”的国民集体记忆。因此，本研究选择港澳学生最多的一所大学——暨南大学作为调查地点，试图探讨解释：与大陆人交往程度的加强是否有助于港澳人对中国国民身份的认同。

三、数据与测量

我们通过分层整群抽样的方法选取广州市暨南大学的港澳学生进行问卷调查。选择暨南大学作为抽样调查地点主要是因为暨南大学一直以来是中国国内招收港澳学生人数最多的一所综合性大学，港澳学生约占全校本科学生总数的三分之一左右。而研究者长期在暨南大学从事教学科研工作则是调研得以顺利开展的便利条件。首先按照分层抽样方法，按照人社科、理工农医的学科分类分别在每个年级中抽取若干班，最终构成了 66 个班的总样本规模，最后采取整群抽样方法对这 66 个班的学生（其中主要包含港、澳学生）进行全部调查。收回 1228 份有效问卷，其中香港籍学生样本 809 个，澳门籍学生样本 419 个。与此同时，我们也开展了对暨南大学在校的内陆学生的调查，共收回 2825 份有效问卷。这些内地学生的问卷数将在本文中作为与港澳学生比较之用。

我们有必要对本文所涉及的核心概念“国民认同”进行操作化界定，以便在定量分析中较准确地获得这一主观态度的相关数据。由于国民认同是多维度的，它是由共同的族群、文化、领土、经济和法律政治等要素组成的复杂的建构（Smith,1991:14），因此在几乎所有的相关经验研究中，尽管对国民认同的测量各不相同，却总是多维度的。一些研究将它操作化定义为人们对其所属国家各方面的热爱与忠诚，通过测量人们对国家主流传统文化、信念等方面的认可、接受、热爱的程度、忠诚感、自豪感，以及人们对国家政治制度、政治理念等方面的认可、接受、热爱的程度、忠诚感、自豪感的量表来判断人们的国民认同状况（Jones & Smith,2001b）。但是，这些“热爱自己国家和为之自豪的感受”的指标同时也被一些学者用于测量人们的爱国主义或民族主义（Kosterman & Feshbach,1989），从而混淆了国民认同与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界限。何况，貌似包含国民认同的多维度测量指标的一些量表其实是缺乏内部一致性的：一个对某个特定国民共同体有强烈归属感的人很可能对其政治制度或主流传统文化给予较低的评价。同样，将国民认同操作化定义为对国民身份的归属感和对国家政治法制的忠诚感或自豪感（Frank Louis Rusciano, 2003），或将国民认同划分为对国家的“归属感认同”、“赞同性认同”（肖滨，2010）也有相似的问题。因为，将这两种有可能背道而驰的个人主观感受合并在一起考察人们的国民认同，很可能会发现令人尴尬的情况：一个激烈地批判这个国家的政治和法律制度的个人，恰恰正是对这个国家或国民共同体有强烈归属感的人。

其实国民认同从根本上说是一种身份认同。安德森将国民认同看作是一种“我们感”，是人们对“想象共同体”的归属感和责任感（Anderson, 1991），这一界定已经被学术界广泛接受。亨廷顿则认为，尽管国民认同的各个因素的重要性随各国人民的历史经历而不同，但它归根结底指的是人们的国民身份归属（亨廷顿，2005）。在本文中，我们将国民认同界定为个人主观的、内化了的归属于某个特定民族国家（或国民共同体）的感受（Huddy et al, 2007:65）。这种界定强调

的是个人对特定国民共同体的归属感,它是一种不取决于其政治态度、文化态度的身份归属意识。这样的定义在经验研究中似乎更能避免引起争议,对于分析港澳人的国民认同而言,尤其如此。须知,中国实行“一国两制”的国策,不仅意味着港澳居民与中国大陆居民分别居住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制度下并拥有不同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利,同时也意味着,即便港澳人不接受或批评中国大陆实行的政治、法律和社会制度,也不一定表示他(她)对中国人的身份或中华民族共同体缺乏认同。政治态度只是可能影响港澳人的中国人身份认同或共同体归属感的因素,但却不应是其构成要素。因此,在操作上,我们主要采用了香港的学者和研究机构曾普遍使用的问卷问题来测量港澳生的国民认同,即:你倾向于选择以下身份?(1)中国人;(2)首先是中国人,其次是香港人/澳门人;(3)首先是香港人/澳门人,其次是中国人;(4)香港人/澳门人。这是一个可以反映身份选择倾向的问题,相对于其他学者对国民认同的测量量表而言¹,这种量表更适合于刚刚回归中国并面临国民身份选择的香港和澳门居民。

四、港澳学生与大陆学生的国家认同差异

1、身份选择:中国人抑或香港人/澳门人?

本研究的问卷调查数据可以与业已在香港地区学术机构和相关学者的研究发现进行粗略的比较。我们几乎照搬香港地区的调查问卷问题向在暨南大学就读的在校学生进行提问,即“你更倾向于选择以下哪一种身份?”。表1展现的数据说明,在暨南大学就读的在校香港学生选择“中国人”、“首先是中国人,其次是香港人”的超过了半数,占54.2%,比香港本地居民于2010年的相关比例38.4%高出15.8%;而选择纯粹“香港人”的比例12.2%,则比香港本地居民的17.3%低5.1%。这些数据说明,在暨南大学就读的香港学生相比香港本地居民具有较高的“中国人认同”,同时对香港的“地域性认同”明显较低。不过,我们在暨南大学开展调查的时间要比香港相关机构和学者的调查晚三四年时间,而且香港本地的调查面向所有年龄段的居民,而在暨南大学进行的调查则仅限于几乎处于同一年龄段的学生,这些因素很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两者之间的可比性。但无论如何,我们还是可以从相关的问卷调查数据中获得一些有用的新信息,有助于了解在中国大陆高校就读的港澳学生对中国人身份认同方面的基本状况以及他们与香港本地居民之间的差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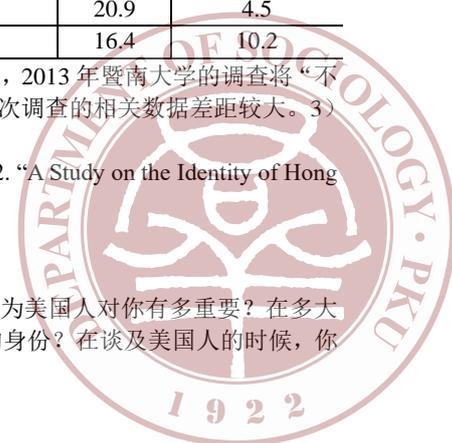
表1 港澳学生与港澳本地居民的国民身份选择比较 单位:%

	中国人	首先是中国人,其次是香港/澳门人	首先是香港/澳门人,其次是中国人	香港/澳门人	其他、不确定或不回答*
香港本地居民 (2010)**	16.5	21.9	44.1	17.3	0.2(其他)
(2010)***	21.1	27.6	13.8	35.5	1.5(不确定)
暨大香港生源 (n=809)	17.7	36.5	24.5	12.2	9.1
其中:香港出生 (n=348)	13.1	32.3	29.9	18.0	6.7
非香港出生 (n=461)	21.4	40.3	20.8	8.1	9.4
暨大澳门生源 (n=419)	11.6	34.7	28.0	19.5	6.3
其中:澳门出生 (n=290)	9.1	33.8	31.7	20.9	4.5
非澳门出生 (n=129)	17.2	36.7	19.5	16.4	10.2

资料来源:1) 2013年暨南大学港澳生问卷调查。2)* 在身份选择问题的选项中,2013年暨南大学的调查将“不确定”、“其他身份”和“不回答”合计在一起,因此与2010年在香港进行的两次调查的相关数据差距较大。3)** 香港中文大学传播研究中心调查数据;*** 香港大学民意调查数据。

这两次调查地点在香港,调查对象为香港居民。参见 Chia-Huang Wang, 2012. “A Study on the Identity of Hong Kong Residents: A Preliminary Investigation”. *Modern China Studies*, Vol.19, No. 2.

¹ 这项研究通过四个问题来测量美国人的国民认同(national identity):你认为成为美国人对您有多重要?在多大程度上你把自己视作典型的美国人?“美国人”这个词是否能较好地说明您的身份?在谈及美国人的时候,你是否经常使用“我们”而不是“他们”? (Huddy et al, 2007:68)



除了向港澳学生提出上述关于身份选择的问题，我们还提出了一系列相关的问题以便多维度地定位他们对“中国人”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观认同状况。表2是采用李克特5级量表测量所获得的数据，包含有7个问题，反映的是在暨南大学就读的港澳学生对“中国人认同”的状况。从表2的数据可以看出，在港澳学生中，港澳本地出生者比非港澳本地出生者具有比较低的“中国人认同”，非港澳本地出生的学生对所有问题的回答都更为积极。例如，“作为一个中国人，你有多自豪？”，非港澳本地出生的学生的平均分比港澳本地出生的学生高0.2分（1分表示根本不自豪，2分表示不自豪，3分表示无所谓，4分表示自豪，5分表示非常自豪）；而对于第5个问题“如果有可能，我愿意放弃自己的中国国籍移民到更好的国家”，非港澳本地出生的学生比港澳本地出生的学生的平均值也稍低一些。这些无疑表明，非港澳本地出生的学生具有更高的“中国人”身份认同感。

统计数据显示，暨南大学内地学生比港澳学生表现出更高的“中国人”身份认同以及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更积极的认同，他们对表2的7个问题回答显得更“积极”。例如，在问及“当你看到五星红旗飘扬时，你有多自豪？”和“当你听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时，你内心有多高兴？”这两个问题时，中国内地学生的平均分数达到3.86分和3.81分，远高于港澳学生的相关平均值。五星红旗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是中国国家的象征性符号，对它们的情感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人们对中国的国家认同状况。

表2 港澳学生与内地学生的国民认同 单位：平均值

问题	香港生源		澳门生源		内地学生
	香港出生	非香港出生	澳门出生	非澳门出生	
1、成为一个中国人对你有多重要？	3.49	3.77	3.47	3.62	3.91
2、作为一个中国人，你有多自豪？	3.30	3.50	3.30	3.52	3.76
3、当听到外国人批评中国人的时候，你是否会很关心或很在意他们的批评？	3.83	4.09	3.81	4.06	4.21
4、如果可以自由选择，我会选择做中国人，也不会选择做其他国家的人。	2.88	3.09	2.91	3.08	3.10
5、如果有可能，我愿意放弃自己的中国国籍移民到更好的国家。	3.54	3.52	3.65	3.59	3.20
6、当你看到五星红旗飘扬时，你有多自豪？	3.22	3.62	3.37	3.56	3.86
7 当你听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时，你内心有多高兴？	3.26	3.56	3.35	3.50	3.81

资料来源：2013年暨南大学港澳生问卷调查。量表中各指标均采用5等级选项进行测量（分别计以1-5分），经独立样本T检验，表中香港生、港澳生的各项数据与内地学生相应数据均有显著差异（P值均小于或等于0.01）。

2、作为中国人的感受

港澳学生对香港和澳门回归祖国究竟有着怎样的感受？这是我们考察港澳学生国民认同的第四个维度。测量这种主观感受的只有一个问题“你对香港/澳门回归中国是否感到高兴？”。如表3所示，通过独立样本T检验，可以发现中国内地学生与港澳学生对香港澳门回归中国的主观感受存在显著的差异。对港澳回归中国表示高兴的中国大陆学生占87.4%，远远超过香港学生的52.6%和澳门学生的48.8%。而“香港出生”比“非香港出生”的香港学生、“澳门出生”与“非澳门出生”的澳门学生也同样差异显著。在香港学生中，17.9%的“香港出生”者表示对香港回归中国“不高兴”和“很不高兴”，比“非香港出生”者的6.7%高出许多；而在澳门学生中，10.0%的“澳门出生”者表示对澳门回归中国“不高兴”和“很不高兴”，比“非澳门出生”者的3.2%高出7.8个百分点。

表3 港澳学生与内地学生对港澳回归中国的感受 单位：%

	对香港回归中国的感受					对澳门回归中国的感受				
	非常高 兴	高 兴	无 所谓	不 高兴	很不 高兴	非常高兴	高 兴	无 所谓	不高 兴	很不 高兴
香港生源 (n=807)	14.9	37.7	35.8	7.6	4.1	14.8	34.6	46.4	2.4	1.9
其中：香港出生	9.8	30.7	41.7	10.1	7.8	9.8	27.7	55.6	2.9	4.0
非港出生(n=460)	18.7	42.9	31.4	5.4	1.3	18.5	40.0	39.3	2.0	0.2
澳门生源 (n=416)	10.1	38.7	46.9	2.4	1.9	15.6	42.6	34.0	4.1	3.8
其中：澳门出生	9.0	35.8	49.4	3.5	2.4	15.9	40.1	33.9	5.2	4.8
非澳出生(n=128)	12.5	45.3	41.4	0.0	0.8	14.7	48.1	34.1	1.6	1.6
内地学生(n=2762)	34.3	53.1	11.4	0.6	0.5	34.0	52.8	11.8	0.7	0.4

资料来源：2013年暨南大学港澳生问卷调查。量表中各指标均采用5等级选项进行测量（分别计以1-5分），经独立样本T检验，表中香港生、港澳生的各项数据与内地学生相应数据均有显著差异（P值均小于或等于0.01）。

3、对中国领土主权的意识

除了上述的“身份选择”、“国民自豪感”等维度外，国家的“领土主权意识”是我们考察港澳学生国民认同的第三个维度。我们的问题是：“如果中国大陆受到某外国军队入侵，你将如何反应？”。这是一项多选题，从表4的数据可见，约半数的香港学生选择采取各种形式的行动谴责和抗击外国入侵中国大陆的行为；相比之下，香港学生比澳门学生在抗击侵略中稍为积极一些。在港澳学生中，非港澳本地出生者维护中国领土主权的意识又分别比港澳本地出生者来得高。

不过，与中国内地学生相比（问题是：“如果香港或澳门受到某外国军队入侵，你将如何反应？”），港澳学生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的意识显然要弱许多。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香港和澳门本地出生的学生，在中国的领土主权受到侵犯时表现出“事不关己”、漠不关心的态度，表示“我不想参与任何抗击入侵行动”的学生比例分别高达13.1%和13.7%。在此有必要进行补充说明的是，表中的“非香港出生”和“非澳门出生”的学生绝大多数人的出生地是中国大陆，他们中的多数又曾经接受过中国大陆的小学或中学教育（在小学或中学的阶段随亲属移民港澳）。我们可以从表4数据看到，这些主要在中国大陆出生的“非港澳出生”的学生与中国内地学生所表现出的维护中国领土主权的意识是比较相近的，这是否可以归因于他们相近的成长环境和教育经历？

表4 港澳学生与内地学生的领土主权意识比较

问港澳生：如果中国大陆受到某外国军队入侵，你的反应是？/问大陆生：如果香港或澳门受到某外国军队入侵，你的反应是？	香港生源		澳门生源		内地学生
	香港出生	非香港出生	澳门出生	非澳门出生	
我将谴责入侵行为	51.2	50.9	47.6	49.5	67.2
我将给抗击入侵的行动捐款捐物	49.5	57.9	37.6	51.4	63.4
只要条件合格，我愿意接受征兵，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并参加战斗	18.7	25.9	18.5	18.0	27.8
我愿意随时准备为保卫中国/香港或澳门不受侵犯而献出生命	8.5	11.1	7.5	8.1	10.4
我将采取其他支援中国的行动	8.1	10.1	4.8	8.1	11.0
我不想参与任何抗击入侵的行动	13.1	5.3	13.7	5.4	4.5
样本量	283	397	227	111	2619

资料来源：2013年暨南大学港澳生问卷调查。量表中各指标的选项均为“是”或“否”，为多选题，受访者可同时多个选项上填答“是”或“否”。

4、对中国大陆社会政治环境的评价

为了探讨港澳学生的国民认同是否与他们对中国的政治社会制度、社会环境的评价相关，我们提出了5个问题，请港澳学生分别对中国的人权状况、民主制度、社会公正、社会法治和中国共产党执政等方面进行评价，在1-10分间给分，给分越高说明评价越积极。

表5给我们展现了这些数据，统计结果与前面的许多数据相似。中国大陆学生对这5个方面



的评价都比港澳学生的评价积极一些，其给分均值明显高于港澳学生。而在港澳学生中，非港澳本地出生者对这 5 个方面的评价均值又明显高于港澳本地出生者的评价均值。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大陆学生和港澳学生对这 5 个方面的评分均值高低排序则比较一致，表 5 显示，中国大陆学生和港澳学生在“中国大陆尊重人权的程度”和“中国共产党执政的评价”两项的评分均值都比其他三项的评价均值高，说明无论是中国大陆学生还是港澳学生都对“中国大陆尊重人权的程度”和“中国共产党执政”的评价比其他三项来得积极一些；而中国大陆学生和港澳学生对“中国大陆社会公正满意程度”的评分均值在他们对这 5 个方面的评分均值中是最低的，说明两地的学生对“中国大陆的社会公正”满意度不高，尤其是香港、澳门本地出生的学生对此项的满意度较低，且其评分均值比较一致，分别只有 3.61 分和 3.63 分。

表 5 港澳学生与内地学生对中国大陆社会政治环境评价的比较 单位：平均值

问 题	香港生源		澳门生源		内地学生
	香港出生	非香港出生	澳门出生	非澳门出生	
我认为中国大陆尊重人权的程度	4.32	4.57	4.18	4.49	5.23
我对中国大陆政治民主的满意程度	3.89	4.23	3.87	4.02	4.76
我对中国大陆社会公正的满意程度	3.61	3.86	3.63	3.84	4.53
我对中国大陆法治的满意程度	3.96	4.08	3.76	4.09	4.70
我对中国共产党执政的评价（满意程度）	4.69	4.99	4.67	5.06	5.58
样本量	348	461	290	129	2825

资料来源：2013 年暨南大学港澳生问卷调查。量表中各指标均采用 10 等级选项进行测量（分别计以 1-10 分，分数越高，则表示越满意），经独立样本 T 检验，表中香港生、港澳生的各项数据与内地学生相应数据均有显著差异（P 值均小于或等于 0.01）。

总之，无论是在“中国人身份认同”、“对中国领土主权意识”（包括对港澳回归的情感反应），还是在对“中国社会政治制度”等方面的评价上，在暨南大学就读的港澳在校学生总体上比港澳本地居民表现出显著的积极倾向，而这种积极倾向又明显弱于内地在校学生；在港澳学生中，港澳本地出生者的国民认同感又明显低于非港澳出生者（实际上多数为中国大陆出生）。我们的这些研究发现与香港学者在早些年的研究结果基本吻合。这些学者的结论是：“那些在中国大陆出生的香港人比香港本地出生的人具有更强烈的对中国国家的归属感。而依据我们的经验，那些在三、四岁就移居香港的人比那些到十至十二岁才移居香港的人存在着巨大的差别；前者在国民归属感方面与香港本地出生的人无异；而后者比前者更爱国，而且他们与中国内地学生的许多观点基本相似”（Mathews et al, 2007:155）。

四、影响港澳学生身份认同的因素

上述调查数据表明，在中国大陆就读的港澳学生与中国内地学生相比具有明显较低的中国国民认同感。导致这种差异的原因究竟是什么？一些学者通过个案研究发现，那些较多往返于香港内地之间、能够熟练掌握和使用普通话、与中国内地居民有较多交往关系的人已经逐渐产生新的“国家想象”（national imagination），尽管他们都没能清楚地表达自己是否有爱国情怀，甚至有些人还严厉地批评中国政府，但“大民族、大国家的空间想象”已理所当然地成为他们日常话语与生活经验的一个组成部分（Mathews et al, 2007:136—137）。遗憾的是，学者们并没有明确地指出这些频繁跨境、与中国大陆人接触的香港人是否比其他人有更强的中国国民认同，但他们的研究发现和观点却使我们不由地提出这样的疑问：促进港澳居民与内地居民之间的社会互动是否可以提升港澳居民对中国的国家认同或对“中国人”身份的认同？

为了解答这一问题，我们以港澳学生的身份认同（即选择作为中国人抑或香港/澳门人的倾向性）、对香港、澳门回归中国的情感反应作为因变量，分别通过 Logistic 定序分析模型和 OLS

多元回归分析模型来检验一些预测变量与上述两个因变量之间的相关性，换言之，考察那些与中国内地学生或居民有更广泛接触并结交成朋友、流利地使用普通话等具有更多两地互动关系的港澳学生是否比其他港澳学生有更高的“中国人”身份认同、对港澳回归中国有更积极的情感反应。

表 6 影响港澳学生身份认同、对港澳回归态度的因素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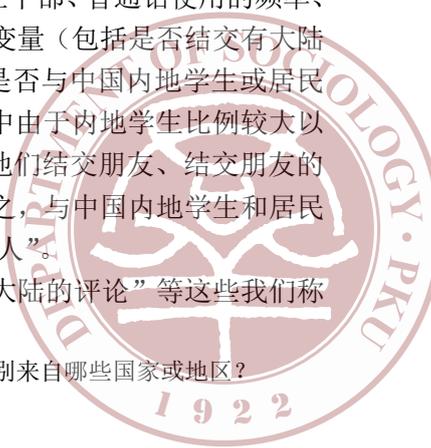
变量	身份认同的 Logistic 定序回归模型	对港澳回归态度的 OLS 回归模型
	阈值 1=-3.194(.351)	标准化回归系数
	阈值 2=-1.124(.333)	
	阈值 3=.593(.335)	
性别 男=1	-.446(.136) ***	.050*
出生地 香港或澳门=1	.641(.141) ***	-.066**
就读中学 香港或澳门=1	.251(.078) ***	-.145***
长辈对中国大陆的评论	-.093(.043) *	.062*
自己所选课程中内地学生的比例	.046(.029)	-.019
自己宿舍中大陆居民或学生的比例	.009(.022)	-.037
自己参与的学生团体中大陆生比例	.026(.026)	.005
是否担任学生干部 担任=1	-.110(.134)	.037
普通话使用的频率	-.021(.030)	.022
对普通话流利程度的自我评分	-.033(.023)	-.004
是否结交有大陆朋友 有=1	-.043(.216)	.051
自己结交大陆朋友的数量	-.081(.081)	-.028
对中国大陆人权状况的评价	-.078(.032) *	.127***
对中国政治制度的评价	-.077(.039) *	.142***
对港澳国民教育的满意程度	-.110(.033) ***	.215***
	Cox and Snell R ² =.204	Adjusted R ² = 0.237
	Nagelkerke R ² =.219	
	McFadden R ² =.087	
	Model Fit X ² =182.824(p<0.001)	
	平行性检验 X ² =33.785(p>0.10)	
样本量	1228	1228

注：第二列的因变量“身份选择”为定序变量，参见表 1；第三列的因变量为“对香港或澳门回归祖国的态度”，参见表 4。括号中的数据为标准差。*表示 p<0.10；**表示 p<0.05；***表示 p<0.01。

表 6 列出了上述两个模型的数据分析结果。Logistic 定序分析模型（又称为定序结果的比例比数模型）显示：“跨群际交往机会”变量（包括自己所选课程中内地学生的比例、自己宿舍中大陆居民或学生的比例、自己参与的学生团体中大陆生比例、担任学生干部、普通话使用的频率、对普通话流利程度的自我评分等）均不显著；而“跨群际交往结果”变量（包括是否结交有大陆朋友、自己结交大陆朋友的数量¹）同样不显著。这数据结果表明，是否与中国内地学生或居民有充分的社会交往的机会（例如在自己的课堂上、宿舍里或学生团体中由于内地学生比例较大以及由于自己担任学生干部而与内地学生有较多的接触），以及是否与他们结交朋友、结交朋友的多寡，与港澳学生对“中国人”身份的选择并不存在相关关系，换言之，与中国内地学生和居民交朋友或更多地结交朋友，并不会促使港澳学生更认同自己为“中国人”。

相反，在港澳本地出生、在港澳本地就读中学以及“长辈对中国大陆的评论”等这些我们称

¹ 在问卷调查中我们采用列表的方式询问每位同学：你目前十位最亲密的朋友分别来自哪些国家或地区？



之为“成长环境”的变量却对港澳学生对身份选择有着显著的影响，尤其是前两个变量非常显著。例如“出生地”为香港或澳门的，其斜率系数达到 0.641，比数比（OR）为 1.898。而“就读中学”所在地为香港或澳门的，其斜率系数达到 0.251，比数比（OR）为 1.285。这些数据表明，当我们把“中国人——首先是中国人然后是香港/澳门人——首先是香港/澳门人然后是中国人——香港/澳门人”等四个定序的身份选项（参见表 1）放在一起时，在港澳本地出生或就读中学的学生比其他港澳学生更倾向于向右选择，而不是向左选择。换言之，在港澳本地出生、在港澳本地就读中学以及“长辈对中国大陆的评价”的港澳学生，更倾向于选择自己是“香港/澳门人”或“首先是香港/澳门人，然后是中国人”，而选择自己是“中国人”或“首先是中国人，然后是香港/澳门人”的可能性则相对较低。

同样，可以统称为“政治态度”的变量（包括“对中国大陆人权状况的评价”、“对中国政治制度的评价”、“对港澳国民教育的满意程度”）也比较显著，尤其是第三个变量“对港澳国民教育的满意程度”非常显著，斜率系数为-0.110，比数比（OR）为 1.116。这一统计结果表明，港澳学生对“中国大陆人权状况的评价”、“对中国政治制度的评价”、“对港澳国民教育的满意程度”这三个方面的评价越消极，越倾向于选择自己是“香港/澳门人”或“首先是香港/澳门人、然后是中国人”。可见，港澳学生的政治态度与身份选择存在明显的相关关系。

为什么港澳学生对香港、澳门回归的反应相对于中国内地学生较为消极呢？我们通过多元 OLS 回归分析，试图解释“跨群际交往机会”、“跨群际交往结果”、“成长环境”和“政治态度”等变量与这种情感反应（参见表 4）之间的关系。很明显，“政治态度”的影响最为显著，对“港澳国民教育”、“中国政治制度”和“中国人权状况”评价的高低与对香港澳门回归中国的情感积极性呈正比（标准化回归系数分别是 0.215、0.14 和 0.127, $p < 0.01$ ）。换言之，港澳学生对这几个方面的评价越低，则越对港澳回归中国感到情绪低落，而评价越高则对港澳回归中国越感到高兴。“成长环境”变量也有较显著的影响，尤其是在港澳就读中学的港澳学生比那些在港澳之外就读中学的港澳学生对港澳回归中国更可能感到“不高兴”（标准化回归系数为-0.145, $p < 0.01$ ），在港澳出生的学生比其他港澳学生更可能对港澳回归中国表现出消极情绪；自己的长辈对中国大陆的评价越消极，则港澳学生对港澳回归中国的情感反应就越消极（标准化回归系数为-0.062, $p < 0.10$ ）。而“跨群际交往机会”、“跨群际交往结果”的诸多变量均不显著，表明港澳学生对港澳回归中国的情绪反应与他们是否与中国内地学生、居民具有社会交往的条件或交往是否亲密不存在相关关系。

五、结论

综上所述，我们得出如下结论：对于港澳本地居民，在暨南大学就读的港澳在校学生总体上对“中国人”身份认同的可能性更高、对中国领土主权意识以及对中国社会政治制度等方面的评价方面更为积极，但这种积极性又显著低于中国内地在校学生；在港澳学生中，港澳本地出生者的中国国民认同感又明显低于非港澳出生者，而非港澳出生者中绝大多数是在中国大陆出生、在中小学阶段迁移到港澳的学生，他们在幼年、小学甚至中学阶段在中国度过，由于还有亲人在大陆，他们经常往返于大陆与港澳之间。

我们曾预测，相对于中国内地学生而言，港澳学生对“中国人”身份较低的认同度、较低的对中国领土主权的意识可能与他们对中国大陆主流语言文化了解较少或缺乏与中国大陆社会的互动有关，换言之，与中国内地学生和居民的跨群际交往条件、机会以及跨群际交往的亲密度存在相关关系。然而，上述两个回归模型的分析结果却否定了这种相关性。我们发现，港澳学生的政治态度和早年成长环境是影响其中国国民身份认同的重要因素。具体而言，出生于港澳并在港澳当地就读中学、其长辈对中国大陆有较多负面评论、对港澳国民教育满意度较低、对中国人权

状况和政治制度评价较低的港澳学生会比其他学生更倾向于选择“香港/澳门人”而不是“中国人”作为自己最重要的身份。同样，具备上述相似特征的港澳学生相比其他学生而言，对港澳回归中国的事实表现出低落情绪的可能性更高。

亨廷顿曾提出关于少数族群的国民认同与其同化程度相关的观点，认为拉美裔之所以有明显较低的美国国民认同感，同时却对其原祖籍国却表现出较强的国家认同，缘于他们同化于美国主体族群（盎格鲁血统白人）的程度较低：他们与主体族群相互隔离、语言文化差异巨大，在美国西南地区形成日益庞大的“西班牙语区”，已经成为分离美国民族共同体的最大力量（亨廷顿，2005）。上述的研究发现没有支持这一理论，相反却印证了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的理论观点，即人们是否认同为一个国民共同体（national community）成员，与是否共享相同的血缘、文化传统、语言没有必然联系。相距遥远、从未谋面而且血缘、宗教、语言、习俗差异很大的人们也可能对同一个国民共同体产生强烈认同（如马来西亚的苏门答腊人和安汶人）；而地理上靠近、语言上相通、宗教信仰相同的马来西亚的马来人和印尼苏门答腊岛东岸的马来人相互间却看作是不同的国民（安德森，2005：115-116）。换言之，少数群体与多数群体在文化上的差异并不足以阻碍他们之间产生“共同体想象”，人们对国民共同体的认同不必需以基因（血缘）、社会文化相似性、面对面或亲密的交往为基础。

根据此次调查研究的结果，我们认为增进港澳与中国大陆居民之间的跨群际交往并建立亲密的友谊或许并非是提升港澳人对“中国人”身份认同的有效途径，今后应更多地关注港澳人的国民认同与其对中国大陆政治制度环境认可度之间的相关性，亦要关注港澳青少年的幼年成长环境以及中小学教育与其国民认同的密切关系，也就是说，我们应该密切关注港澳青少年的幼儿、小学、中学的教育环境与教育内容，增加有关中国正面形象的教育内容，从而增强他们对“中国人身份”的认同和中国的国家认同程度。

当然，由于此次调查样本仅局限于就读中国大陆高校暨南大学的港澳学生，因此在我们认识当代港澳人的国民认同状况及其影响因素时，本研究的发现与结论仅供参考，期待更多的相关研究。

参考文献：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岭南大学公共管治研究部，2009：“港人对香港政府及公共组织信心及国家认同的意见调查”，
<http://www.ln.edu.hk/pgp/level2/pgp-sur-f.htm>。

马杰伟、冯应谦、林萃光：《后京奥香港身份认同》，载于吕大乐、吴俊雄、马杰伟合编：《香港生活文化》，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1年。

王家英：《香港人的族群认同与民族认同：一个自由主义的解释》，香港大学香港亚太研究所，1996年。

王家英：《公民意识与民族认同：后过渡期香港人的经验》，香港大学香港亚太研究所，1997年。

王家英：《香港人的公民意识与民族认同：回顾一年的发展》，香港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1999年。

王家英、沈国祥：《回归后香港青少年的公民意识》，香港大学香港亚太研究所，2002年。

王家英、尹宝珊：“对中国的重新想象：回归后身份认同的延续与变化”，收录于刘兆佳等编《香港社会政治的延续与变迁》，香港大学香港亚太研究所，2004年。

王家英、尹宝珊：“香港市民身份认同的研究”，《二十一世纪》第101期，2007年。

香港大学民意调查中心：“市民的身份认同感”，2010年，<http://hkupop.hku.hk/>。

肖滨：“两种公民身份与国家认同的双元结构”，《武汉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



- 萧新煌等：“‘中国印象’的变与不变：台港民众的认知比较，1997—2004”，收录于黄绍伦等编《新世纪台港风貌》，香港大学香港亚太研究所，2008年。
- 郑宏泰等：“身份认同：台港澳的比较研究”，《当代中国研究》2008年第2期。
- Frank Louis Rusciano .2003.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Identity: A 23-Nation Study”. *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 Vol. 56, No. 3.
- Fung, Anthony, 2001. “What Makes the Local? A Brief Consideration of the Rejuvenation of Hong Kong Identity”. *Cultural Studies*, Vol.15, No. 3/4.
- Fung, Anthony, 2004. “Postcolonial Hong Kong Identity: Hybridising the Local and the National”. *Social Identities*, Vol.10, No.3.
- Jones, F. L. and Smith, P. 2001b. “Individual and Societal Bases of National Identity: a Comparative Multilevel Analysis”. *European Sociological Review* 17 (2): 103–18.
- Kosterman, Rick, and Seymour Feshbach. 1989. "Toward a Measure of Patriotic and Nationalistic Attitudes." *Political Psychology* 10 (2):271.
- Lau, Patrick W., Michael H. S., Lam, and Beeto W. C. Leung, 2010, “National Identity and the Beijing Olympics: School Children’s Responses in Mainland China, Taiwan & Hong Kong.” *Procedia: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No.41.
- Lau, Siu Kai, 1997. *Hongkongese or Chinese: The Problem of Identity on the Eve of Resumption of Chinese Sovereignty over Hong Kong*. Hong Kong: Hong Kong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Leonie Huddy and Nadia Khatib, 2007. “American Patriotism, National Identity, and Political Involvement”.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51, No. 1
- Mathews et al, 2007, *Hong Kong, China: Learning to Belong to a Na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Smith, Anthony.1991. *National Identity*. London: University of Nevada Press.
- Wong, Timothy Ka-Ying, 1996. “The Ethnic and National Identities of the Hong Kong People: A Liberal Explanation”. *Issues & Studies*, Vol. 32, No.8.
- Wang, Chia-Huang. 2012. A Study on the Identity of Hong Kong Residents: A Preliminary Investigation. *Modern China Studies*, Vol. 19, No. 2,

